



# 雷锋精神历久弥新

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对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作出重要指示——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半个多世纪以来,雷锋的名字像一面鲜红色的旗帜,矗立在广袤的神州大地上。今年是毛泽东同志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发表60周年,也是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诞生30周年。那几个苍劲大字成为一个时代的旗帜,推动了浩浩荡荡、跨越世纪的学雷锋运动,成为新中国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向雷锋同志学习”,首发在1963年《中国青年》第5、6期合刊上,时下,这份《中国青年》和“雷锋收藏”成为收藏热点。那为什么毛泽东同志要把这份题词写给《中国青年》?

1962年8月15日,22岁的雷锋在辽宁抚顺因公殉职,结束了他短暂而又光辉的一生,他的事迹在辽宁省内传扬开来。1963年2月初,首都各大报刊刊登了雷

锋的日记摘抄,那些朴素简短的语言,无处不闪耀着共产主义的光辉。

为了向全国青少年宣传好雷锋,《中国青年》编辑部决定,以专辑形式缅怀雷锋同志。

当时国家纸张非常紧张,此前的《中国青年》不得不由每期32页缩减为24页。而24页篇幅做一期“学习雷锋同志专辑”,显得分量太轻,于是,编委会决定,将5、6两期合刊,出一期48页的专辑。

当年毛泽东同志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使刘胡兰的事迹广为人知并激励了亿万青年,现在出了雷锋这样一个新时期的先进典型,如果毛泽东同志能题词,那将会有多么巨大的号召力啊!一群敢闯敢干的年轻编辑,向毛泽东同志发出了请他题词的信函。

在希望和志志中,1963年2月22日,《中国青年》编辑部接到毛泽东同志办公室的来电:“主席的题词已经写好了,请派

人到中南海西门来取。”听到这一消息,整个《中国青年》编辑部都沸腾了,大家欢呼雀跃,久久不息。

1963年3月4日,新华社向全国发出通稿:《〈中国青年〉出版学习雷锋专辑毛主席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3月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等首都各大报纸刊发了题词或通稿。

由此,1963年3月5日便成了毛泽东同志“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纪念日,成为学雷锋日。

当时的《中国青年》除了北京印点外,还在上海、沈阳、西安、长沙、重庆设了5个分印点,出版的这期“学习雷锋同志专辑”,由5个分印点印刷。此外,仍有各地人民出版社、共青团组织翻版印刷,有些地方还多次印刷,仅包头市一地就曾两次翻印。

几经重印,当期累计印数高达800多万册,仍不能满足读者需要。



1963年《中国青年》杂志第5、6期合刊“学习雷锋同志专辑”封面

1993年12月,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正式开展;2000年开始,每年的3月5日成为“青年志愿者日”。至今,雷锋精神经久不衰,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把崇高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质追求化为奋勇前行的精神力量。

本版综合整理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耕作、游春、赏花……古画里春意盎然

## 古画里的春天

秦梦西

春耕图轴



江南水乡的景、苏州文人墨客的诗画,总是密不可分。陆治是明代画家、书法家文徵明的门生,以吴派工雅秀丽的画风擅名。

陆治的《春耕图轴》中,黄发垂髻的小童跳足牧放,青牛涉水而出,白衣蓑笠的农夫赶牛,亦不忘时时回首召唤。牛犊与黄牛,一老一小,在万物萌发的时候赶去春耕。

画面中,树枝以略湿润的藤黄画出,而树干以枯索的浓墨勾染,林间静谧的风吹过嫩芽,正催生萌动的枝条生出绿意。与王蒙的繁密、堆叠、扭曲的山石皴法不同,陆治以干湿互用、清淡合宜的笔法,寄春天的秀润清新于冬末的厚重浑穆之中,使画作呈现出一派静谧祥和、万物回春的景象。

春山游骑图轴



周臣作为画家,或许并不为人们所熟知,但他的弟子“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的唐伯虎,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周臣的《春山游骑图轴》中,大山巨石之中古松屹立,溪桥之上游人骑乘回首侧身远眺,前有农夫引路,后有家童挑担,想必那担中的食盒里,定是些甘洌茗品,以及精细美食,不然,怎配得上笠帽宽袍的文士春游出行时的那份闲散惬意。

《碧桃春燕图轴》



《碧桃春燕图轴》中,清末画家任颐以寥寥数笔,把燕子俯仰飞动、辗转啾鸣的可爱形象落于笺素之上。

燕子背羽施以浓墨,双目漆黑,开合不定的鸟嘴以朱砂配赭黄,显示出新燕羽翼初丰的蓬勃生命力。

## 太原郑村新石器遗址

龙 真

2月28日,6项“2022年度山西重要考古发现”公布,太原小店郑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位列其中。郑村遗址首次发现了山西境内相对完整的一处龙山时期地坑式院落,其建筑布局完整、生活要素齐备,较为完整地展示了太原盆地龙山时期聚落的面貌,为深入研究晋中盆地龙山时期文化与北方石峁文化、晋南陶寺文化的联系提供了新的资料。

让我们来看看郑村遗址的发现过程和小平场、地坑院、“非”字形火道、陶铃铛等有趣的遗存。

2022年7月至11月,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为配合山西省第二人民医院新院建设项目,对太原市小店区郑村遗址进行了发掘。发掘地点位于太原市区东南部的郑村以北、龙兴街以南、光明路以东、东沟以西的医院建设区域内。该区域属系舟山山系的山前冲积扇,地势东北高、西南低,整体呈缓坡状,较为开阔。

发掘共揭露新石器时代遗址755平方米,发现龙山时期房址6座、灰坑24个、窑址3座、围沟1条。遗址内出土的陶片主要有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只有少量的泥质红陶;陶器的制作多为手制,加慢轮修整;器表多饰篮纹和绳纹,二者所占比例大致相当,此外,还有部分为素面及素面磨光;主要器形有甗、鬲、甗、罐、甗、豆、盆等,还出土有陶环、陶铃铛、卜骨、石刀、石斧、石铲、骨锥、骨笄和玉饰件等器物。时代涵盖龙山文化早、中、晚不同时期,文化面貌与汾阳杏花遗址、阳曲西殿南遗址相似。

遗址的西部为聚落的核心区,周边环境有围沟,核心区内的五座房址与一座窑址围绕中心小平场分布,小平场的出口位于窑址与3号房址之间,所有房址的门道均面对中心小平场,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地坑院”式聚落中心。

房址地面均涂抹白灰面,中央设有圆角方形火塘,根据壁面保存情况推测,应为窑洞式建筑,2号房址的白



“非”字形火道陶窑



H6陶器器物组合



H21出土的陶铃

灰地面上有一副完整的猪骨架。1号窑为龙山时期典型的“非”字形火道陶窑。围沟东部完整,南部残壁面几乎垂直,残存深度1米左右,整体规模较小,功能可能以防水为主。

遗址核心区域内还发现数个灰坑,填土中出土较多遗物。其中6号灰坑位于中心广场内,出土有单把鬲、深腹罐、釜灶、折肩罐、卜骨、骨锥、石刀等遗物。21号灰坑位于东侧围沟中部区域,出土有双鬲罐、陶铃铛等,21号灰坑出土的个别陶片可与6号灰坑出土陶片拼接在一起,说明二者废弃的时间接近。14号灰坑为袋状灰坑,位于聚落东北角的围沟内侧,发现有较完整的一副猪骨架和三副羊骨架,出土陶片可辨识器型的有甗、鬲、甗、罐、盆等。

核心区以外分布着两座窑址和一座房址,2号、3号陶窑址均为窑床式升焰窑,6号房址位于核心区以东、发掘区东北角,仅存西半部,中部有火

烧痕迹,中部偏南有柱洞。

在遗址西南部还发现一处灰坑,与核心区域距离约112米,编号为H9。平面呈椭圆形,其中的填土呈北高南低的坡状,出土器物有罐、碗、豆、陶环、陶抹子、陶铃铛、石斧等,年代与核心区相近。

郑村遗址是继阳曲西殿南、尖草坪镇城遗址之后太原发现的又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该遗址建筑布局完整、生活要素齐全,房址、窑址、小平场、围沟一应俱全。虽然面积不大,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类集群而居的社会形态,较为完整地展示了太原盆地龙山时期聚落的面貌。郑村遗址与狄村遗址、东太堡遗址、许坦遗址距离较近,时代却比这三处遗存稍早,为深入研究晋中盆地龙山时期文化与陕北石峁文化、晋南陶寺文化的联系提供了新的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



唐代“树下老人”屏风壁画(太原博物馆藏) 箫凡摄

## 林下风度

赵 超

太原博物馆的一个展厅内,陈列着太原市晋源区生态工程学校赫连山墓出土的数幅唐代“树下老人”屏风式壁画。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太原一带出土了20多座带有屏风式“树下老人”壁画的唐代墓,以赫连山、赫连简兄弟墓为代表的这类壁画是唐代壁画墓中一个重要的类型,该绘画题材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

唐代墓葬中屏风式壁画,主要流行于山西太原、陕西西安以及新疆吐鲁番等地区,宁夏固原亦有一例梁元珍墓。这些墓葬的主人身份不一,有地位比较高的官员贵族,也有一般士人。

太原地区是屏风式壁画墓的一个主要流行地区,以金胜村6号墓为例,建筑时代约为西周时期,

为小型穹窿顶砖室墓。墓室西、北、东壁,棺床上方有8幅屏风壁画,其中6幅为在树下站立的老人像,2幅为侍女。此外,金胜村及附近出土的唐代壁画墓中,绘有几十余幅屏风树下老人像。

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宿白先生曾指出,太原西南发现的唐代折扇式屏风壁画,可能先流行于地方墓葬里,当首都长安墓葬盛行这种题材的壁画后,才普遍地流行起来。专家们推断,屏风式壁画墓或许是在长安地区与太原等地基本同时流行开的,甚至可能是在中央长安创始后再传到各地的;也许许长安与太原两地有着不同的墓葬形制与装饰系统,各自独立演化,而后随着传播互相影响与融合。

太原地区唐代壁画墓内容中最

突出的一点是基本上都采用“树下老人”这样的题材。“树下老人”表现的是从汉代到南北朝期间非常流行的忠臣、隐士、贤人等历史人物绘题题材,其文化内涵来源于传统的中原儒家文化,构图形式很可能来源于南朝的“竹林七贤壁画”,体现了太原等地“树下老人”屏风壁画的悠久文化传统与儒家教育色彩。

而墓中屏风壁画的装饰手法,可能来源于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屏风装饰。屏风与床榻的组合,是隋唐以来普遍使用的日常家具。它可供睡眠,也可供平坐卧,可在室内摆放,也可在庭院中安放。在敦煌等地保存的多幅北朝至唐代的佛教壁画《维摩诘经变》上便描绘了在庭院中坐榻对论的场面。



鸟形銮铃(晋国博物馆藏) 箫凡摄

銮铃,车马器,起源于西周,多为球形,是安装在车轭或车衡上的铜铃,声似鸾鸟鸣叫。晋国博物馆馆藏鸟形銮铃,极为罕见,发掘出土仅此一例。

这对鸟形銮铃出土于山西曲沃北赵村晋侯墓地113号夔父夫人墓,上为铃,铃部为鸟形,圆目,尖喙,高冠,尾部上翘。鸟腹部两面各有四个三角形镂空,内置铜丸;下部铃颈较窄,二次阶梯状下为方形銮,光面直边。鸟形銮铃双面镂空,并不符合最优的发声原理,想必设计者更倾向于它的图腾崇拜与装饰功能。

周礼中有“五御”,即五种驾车的技术,包括鸣和鸾、逐水曲、过君表、舞交衢、逐禽。鸣和鸾指的是驾车入门课程。装在车衡上的铃称为銮铃,装在车厢前面轼上的铃称为和,“鸣和鸾”要求车辆启动时和行进间铃声要协调一致。如果马与车的动作不能协调,铃声就会紊乱。经过长期训练,驭手才能使马和车的行动配合起来,车铃才能发出节奏有序的声响,“鸣和鸾”就是为了调试驾车的节奏。

车上装銮铃,一方面是行车时警示路人,车马未到,铃声先至;另一方面可以麻痹马的听觉,长时间嘈杂的铃声会使马对声响的刺激变得迟钝,从而在驾车时不易受其他声响的刺激而受惊,保证车辆平稳行进。

车马在古代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发展到西周时期,车马被赋予了新的礼制意义,并广泛运用于祭祀、朝觐、军事和田猎等领域,成为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车马在使用上有严格的等级区分,身份地位不同的人使用的车马、车饰、马饰等都有等级之分。銮铃也是贵族身份地位的象征,等级不同的数量不同,对銮铃也是有规制的,以往考古出土的銮铃多为中规中矩的椭圆形銮铃,其他形状的极为少见。

夔父夫人墓出土的小车,应该是夫人生前在宫廷内苑代步的生活用车,而不是正式外出、朝会所用的车马仪仗,不用特别讲究礼制规格、讲求发声功能,更为追求审美的精致、精巧。此外,鸟形銮铃体现了周人凤鸟崇拜的文化特色。

鸟形銮铃鸣千秋

王瑞华